



治字漫谈

我的五四书屋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华北大学奉命移驻京都，四部研究部被分配在东厂胡同一号即胡适曾住过的宅院（这时胡已乘机南下），我于3月间作为四部的先遣人员先期到北平。这时副校长兼部主任范老（文澜）从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附近早已到达，他和戴老（范老的爱人）就住在胡适住过的房子里，生活、办公、读书均在此院的正房。正房和前院之间，有一个大会客室，很气派，暖气管都包装得很讲究，上边的木罩特别宽大，我进城后的第一夜就睡在会客室的一个暖气管的木罩上。这个院落的电话（传达室内）很好记：“5400”胡华教授告诉我，这个号码是胡适向电话局要来的，为了纪念“五四”。确否不知，反正我当时是相信了的，要不怎么会如此巧合呢？

1984年5月，我的《五四运动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同年10月，人大调整住房，把我分在林园5楼4号。这原是“文化大革命”前人大副校长的住房，有一间办公室直通楼道，而又有另一门直通内室，内室又有一正门。这样，属于办公的来访者即可直接进外边的门，不必登堂入室。我进住后也就把这间办公室当作了自己的书房。

一日，胡华教授来此小坐，他笑着说：“你刚进城时住过的胡适住宅的电话是5400。今天你又搬进5楼4号，将注定你这一生要研究五四了。”我听了后，只当作笑谈，也未在意。不想此后的不少来访者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因为研究‘五四’所以住房也是5楼4号？”我连忙回答说：“不！不！这完全是巧合。”后来听说系办公室也向来访者介绍说：“你到5楼4号去找吧，他是研究‘五四’的，很好记。”

天长日久，这种巧合，也为家庭认可了。老伴还为此刻了一枚“五四书屋”的图章，并盖在她所习作的花鸟画上。

这就是五四书屋名称的由来。

但，这间书屋，却是一只木箱、一个书架逐渐积累起来的。

进城之前，我在正定华大四部当研究生，四部设在王士珍（袁世凯手下的三大干将之一）家的宅院里，我和一位资料员同住在王宅正房边的一间耳房，共用一张旧式的方桌，读的书都是从资料室借来的，数量不大，也无书架，都散乱地放在桌子上。进城之后，我由四部调到一部当助教，这时有了一只宝贵的书箱。箱子原来是农村木匠做活的一种大工具箱，也没有任何油漆。它原是从正定四部往北平迁移时运书的许多大木箱中的一只，算是我到一部工作时借用的，并装

有从资料室借来的许多图书。这只木箱伴随了我许多年，对我的教学和科研帮助很大。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我当上了第一批的主讲教员，算是有了一间单独的住房，除了原有的木箱外，又增添了一个书架。这时，也有了点稿费收入，连同工资余额，着实购进了不少图书，一人高的中等书架差不多布满了，虽然如此，但仍称不上书房。

1956年人民大学在张自忠路一号盖了三座红楼，我也分得了一套三间的住房。这时，家庭人口增加不少，但我仍挤出一间作为我的书房。特别是在何干之教授家看到了他新订做的八个大玻璃书柜，使我羡慕不已。在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的情况下，我也集资仿做了四个玻璃书柜，并购置了大批书籍。这样，算是有点书房的味道了。1958年人民大学在西郊盖成一批林园楼住宅，我家由城内搬到西郊，但书房的形式变化不大，因为有若干年我在近代史所八角亭编书，吃、住及所用的资料都是所里供给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书房也受了灾难。红卫兵小将不断来“借书”，我的上初中的孩子也把我的许多书当作“四旧”卖废品。特别是两派武斗时，竟把我住的楼房当作前沿和武斗指挥部。全家被扫地出门，只好到亲戚家去借住。归来时发现图书散失过半。不过这时已无心研究，只要能安居下来，就是最大的希望了。

说是“无心研究”但自己对尚未完成的《五四运动史》的手稿已有30万字仍念念不忘。因此在1969年人大停办、在江西余江办五七干校时，别的我可以一切不带，但有一只木箱是必须带的，这就是前面说的那只入城时不久从解放区

带来的木工工具箱，箱子里放着 30 万字的手稿以及有关修改、补写的图书、资料、卡片等。

到江西余江后，干校挑选了 100 余名壮劳力组成基建连，从事打石头、锯木头、盖房子，我是被选中的一个。100 多人住在一个大采石坑里，上面加了顶子，五七战士们把它叫做“水晶宫”。宫中并排挤着 100 多张木床，不过也留出了若干狭小的通道，以便进出。我的床位正好在狭小通道的尽头，因此我利用这个位置倚墙放下了我那只宝贵的小木箱。这样，我就能在打石头、锯木头、做馒头等劳动之余，坐在小马扎上来反复阅读、修改我那部手稿了。

这样，我在离开了北京的林园书房后，又在干校狭小的天地里建立了自己的小书房。

从干校归来，特别是人大复校后，我又有了自己的书房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学术界复苏、繁荣，报刊、图书也多起来了。老伴特为我的四个玻璃书柜请木工师傅在上面又加了四个顶柜。这样，从地下到屋顶，书籍就布满了整个一面墙了。为了不妨碍家人的休息，我在书房中安置了一张单人床。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无论寒冬酷暑我都晚睡早起地每日工作十几小时。这样，终于完成了 50 多万字的《五四运动史》初稿并于 1984 年 5 月正式出版。

同年 10 月，搬进了现在的五四书屋，就更为宽敞了。除了原来的四个书柜外，又增加了四个，这样就不是布满一面墙而是两面墙的书籍了，单人床不再设于室内，而是换上了沙发。虽然仍属“陋室”，但也开始接待“鸿儒”与“群贤”了。十几年来，专家、学者（包括国际的及港台的）来访的不少。我与研究生的聚会也都在这间“陋室”里谈笑风生带来欢

乐不少。

近年来购书不多了（因为图书泛滥，买不胜买），但所受赠书却是不少，而且是大部头的多卷本，并附有光盘。因此我的书房又不得不扩大到内室，并添置了 VCD 影碟机 播放这些声像文史作品。

去年夏季我到华盛顿探亲，在航空博物馆中看见一个数据，即现在的一个芯片（Chip）要顶上过去 100 万个二极管、三极管。我也和几位当年研究电脑的青年博士（都是儿子的同学，70、80年代去美学习的）交谈过。他们说当年开始研究这些东西时，也未料到今天发展得这样快。眼看 21 世纪到来，将发展到怎样的地步？他们也很难预料。

我们正处在知识爆炸的年代，单靠一间书房是不能适应了（我的书柜中的书具已摆成内外两层，查找很不方便）。在儿、孙们的帮助下，家中添置了电脑，相信通过国际互网络阅读中外文史图书资料也不是很遥远的事。我的书房已无法再扩大了，也不准备再增购很多图书了。

板凳须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两句话是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的治学格言，它对我的学史、治史影响极大。商丘师专学报创刊，约我写点东西。苦思良久，无以为文，谨以此格言相赠，并略作解释。

我是 1945 年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史地系学习的。在校学习期间，就读了范老的一些著作，如《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1948 年，我帮助胡华同志编写中国近代革命史教材时，又认真研读了范老的《中国近代史》并根据他的著作缩编了一本《简史》作为学员的阅读材料。同年夏，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由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

成仿吾分任副校长，范老并兼任研究部和中国历史研究室的主任。这时，我也到了中国历史研究室当研究生。这样，就在范老的直接教诲之下了。那时的研究生为数不多，主要是为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下册搜集材料，并参加一些上册的修订工作。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到 1949 年进北京城以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建国以后，中国历史研究室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一度称中国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我则留中国人民大学（由华北大学发展而成）教书。机构虽有变化，但我仍经常去看范老，向他请教，并不断参加近代史所的一些学术会议。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和李新等同志一起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又是借用近代史所的房子和资料，而且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年。这样，接受范老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

范老经常教导青年人的一句话是：做学问，要坐得住冷板凳。他认为：搞文学，没有才华是不行的。特别是当诗人，没有灵感是不行的。而搞历史，就不一样，只要肯下苦工夫，持之以恒，就必然会有成就。下一分工夫，就有一分成就，工夫愈深，成就愈大。因此，他劝人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得十年。许多人都听过他这样的叮嘱。他很幽默地说：既然搞学问，就别想做官。要想做官，就不要进研究所。近代史所 100 多人，我这个所长才是一个“连长”（指 100 多人相当军队一个连）你到我这里做官，能有什么前途呢？60 年代的一位大学生，对范老的这些话听不进去，“文化大革命”中当了“造反派”。十年的岁月把业务都荒废了，至今一事无成，他很后悔当初没有听范老的话。

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没有肯下死工夫的人。

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搜集，也可以观测一时的风尚习惯 和社会情形的一般 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版 第 25 页）。

因此，我们青年人无论做什么事，特别是做学问，研究历史，一定要持之以恒，而不要三心二意，一曝十寒，更不要学懒汉那样自己原谅自己：“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虫冬又冷 收拾收拾等明年。”一年一年过去了 不觉老之将至，而仍然是一事无成，那真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都吃过这样的苦头，奉劝青年朋友接受这个教训。我们一定要发扬鲁迅先生所说的韧性战斗精神。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范老经常教导青年人的另一句话是：做学问，写文章，要言之有物，不要发空论。1961 年，他针对当时一些文风不正的现象，发表了一篇《反对放空炮》的文章，对历史学界影响很大，大家认为范老讲得很对。我们从范老的著作也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材料丰富，文笔生动，寓论于史，引人入胜。我听过范老的学术报告，也听过他在一些座谈会上的发言。这个特点也是很显著的，他从来不说空话、大话。他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教育，也是现身说法，循循善诱，从不拿大帽子压人，也不摆长者的架子训人。他在 1949 年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时就讲过：“真理在我们这边，依靠真理就是一切成功的保证，我们的任务在于诚恳地、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们看见真理之所在。我们相信，青年一旦看见了真理，那就如水归壑，沛然莫之能御了。坐春风而化时雨，人人乐于自我改造 这才是教育成功。”又说：“我们教育工作者 对广大青

年应抱‘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的信心慎重将事，来完成党给华大的重大任务。（见 1949 年 5 月出版的《华大生活》）

一条是坐冷板凳，一条是不要放空炮。这是范老经常教导青年人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两条治学经验。因此，有的同志就把范老的这两句话，编成了这样一副对联：

板凳须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现在这两句话已逐渐流传开来，成为治学格言了。我在教学中，经常用这两句话结合自己的感受来教育学生。现值商丘师专学报创刊，我愿意再一次提出来，与青年朋友共勉。

谈观点和史料的统一

有一次，我和一个学历史的同学谈话，谈的是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在谈话中，这个同学对北伐战争胜利的原因等等，讲得有条有理。但是，当谈到北伐的对象，即敌人的部署情况时，他却茫然无知了。这使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同学所谈的那些条、理，是不是真正理解了的和巩固了的东西？谈革命不了解国情，论北伐不明了对象，不正是“无的放矢”吗？光知道几条结论，而不了解这些结论所根据的事实材料，其所知的当然不能算作真知。

其实，恐怕这也怪不得学生，而是因为教师也没有交代清楚。由此我联想到：我们历史教学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是不是在自己的教学和写作中，有满足于抽象的概念而未能引导学生和读者去获得具

体知识的地方？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是多么需要这种“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啊！

搞历史的同志既然要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探讨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那么就必须对历史资料工作予以足够的重视。1960年12月间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指出：“资料工作，包括实地的社会调查和文字资料的搜集、积累、整理和编纂，是研究和著述工作的基础……缺乏这个基础，研究工作就会流于空泛的议论，不可能做出任何好的成绩……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动手做调查、搞资料……资料工作必须有战斗性和思想性，必须为着战斗的目的和需要，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不能为资料而资料。”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曾经对资产阶级学派的唯史料观点进行过批判，这当然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把史料和历史科学混为一谈，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他们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去选择史料、曲解史料或捏造史料的。但是，我们批判资产阶级的史料观点，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轻视资料工作。

有过这么一种看法，好像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专门搞理论的，而资产阶级史学才是专门搞资料的。这种把史料和观点割裂开来的看法，表现为两种现象：一些人认为自己是专门搞理论的，而对于资料工作有不同程度的轻视。在他们看来，似乎理论工作才是创造性的劳动，而资料工作是无足轻重的；或者资料工作由别人代做即可，自己是无须亲自动手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还是搞搞资料吧！”在他们看来，似乎搞资料工作是完全不需要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其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资料工作也是有很大意义的。

不错，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要总结历史现象，找出历史规律，并概括为正确的理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果不重视材料，能凭空地产生结论么？当然不能。马克思写《资本论》钻研过 1500 种以上的书籍，可以说他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从事搜集和分析材料的工作。马克思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但是他大约在 1881 年逝世以前不久，为了研究问题的需要，还根据大量的文献编写了一部《印度史编年稿》。马克思要求他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要以事实作根据。他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从事实中总结出科学的理论，揭示出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好像很不重视观点，但是他们在处理史料时，果真没有自己的观点么？当然也不是。古代的历史学家，也是既讲材料也有观点的。司马迁作《史记》就有“太史公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有“臣光曰”，这就是观点。人们在研究社会历史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中，是总会有着自己的观点，总会表示出自己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的。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史料和观点割裂开来。历史研究工作应该从史料和观点必须统一的角度上去进行。懂得了史料和观点的统一，也就懂得了史料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不可加以轻视。

近年来，一些同志常常说，我们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应该“以论带史”。“以论带史”，可以有正确的理解和做法，也可以有错误的理解和做法。在这里，如果把“以论带史”理解为以马克思一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对于全部历史研究过程的指导，如毛泽东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那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把“以论带史”理解为对于自己所要研究的课题，不需要先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而只要依靠现成的结论，“带”上几条合乎口径的史料，即算完成了科学任务，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这种理解和做法，违反了认识事物的规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先有感性认识，然后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历史学同样是这样，总是先接触到大量的史料、事实，然后才能引出结论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也是从大量的实际材料中总结出来的。一切部门的科学研究总是如此：从事物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科学的观点；这种科学的观点，反过来指导着对新事物的探索；而对新事物研究的结论，又不断地丰富着和发展着原来的观点。如此循环往复，一步深一步，以至无穷。因此，那种认为无须对历史材料进行艰苦的劳动，而只依靠若干现成的概念，就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观点，必将把“以论带史”变成为“以论代史”从而必将导向历史科学的取消。恩格斯说得好：“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的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来适合于它，那末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

当然，我们说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是就研究工作的过

程来说的，而不是说在一篇论文和一本著作中必须把所接触到的材料都排比出来。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

就研究的过程看，材料形成了观点；就论文的表现看，观点统率着材料。在材料形成观点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起着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又是历史实际材料形成的。材料形成观点，观点指导材料；材料再形成观点，观点又指导材料。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就是这样一步深一步地前进着的。

科学研究是知识更新的重要途径

教了几十年的书，也随之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工作。有什么体会？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教学相长，教学与研究相互促进。

教学与研究，密切相关，但又性质不同。教学是传授已知事物的规律和知识，科研则是探索未知事物的究竟。教学要求知识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公认性，科研则要求有独创性，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一般地说，对于一个已经掌握了基本专业知识的人说来，教学是不太困难的。只要善于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把它组织在自己的讲稿中、再讲究一点教学法，语言生动，带有启发性，便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而科研则要求有一个比较长期的